

# 越王者旨於賜劍：越民铸宝剑 出匣吐寒芒



寿县博物馆展出的越王者旨於賜劍

1995年12月,安徽寿县南城门外修建外环路。当时的县委、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经常利用星期六时间参加义务劳动,进行人工挖路基。寿县古城外地下文物多,1983年就曾在城外西南方位发现一个墓葬密集区。根据以往考古调查掌握的情况,这里是一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重要的蔡国贵族墓地。

“这次在这附近动土修路,也随时可能挖到古墓。”当年,副馆长许建强还在寿县文物管理所工作时,就经常留心去看。“不同时代的墓葬填土是不一样的,原生土和墓土也是不一样的,从挖出来的土分析,能够知道地下有没有古墓。”许建强记得那天是星期六的下午,他沿着工地由东向西踏查,走到西圈路段时,结果看到有刚挖出来的墓葬“五化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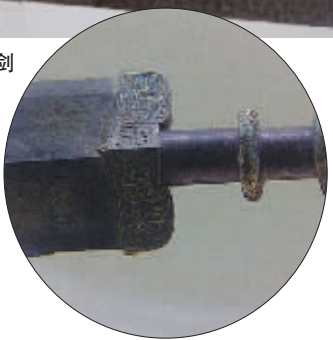
第二天,许建强带着洛阳

铲又来到现场,重点对西圈沿路基两侧动土区钻探,发现地下有几座古墓葬,他立即向县里进行了汇报,请求进行抢救性发掘,否则可能会有人借修路机会进行盗墓。

也正如许建强所料,就在他向上报告的当晚,有人对古墓实施了爆破盗墓,好在盗贼未能得手。县政府批了五千元经费给文管所,对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我们当时是边勘探边发掘,共清理出四座古墓。

古墓清理工作持续到1996年元旦,这一天对许建强来说是一个极其难忘的日子。当天,发掘工作持续到傍晚,三号墓已接近墓底,部分陪葬品也随之初露端倪,即将被揭开神秘的面纱。

“为确保墓内随葬品的安全,我们准备挑灯夜战,加班清理。”许建强说,就在这时,随着发掘清理工作的不断深入,位



于墓主人左侧的边厢处发现了一柄镶嵌有绿松石的青铜剑。紧接着,透雕螭龙饰件、龙形构件以及龙首盖弓帽等一批制作精良的青铜车马器等陪葬品,相继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这一发现,使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为之精神振奋,喜悦心情自然不言而喻。大家清理泥土、测量、绘图、拍照、填写标签,提取包装,一时间忙乎个不停。此时,所有的考古人员都想不到,发掘出的这把青铜剑,到底有多大价值。

“青铜剑出土时就已断成了三段,外面还包裹着泥,我们连泥一起装箱,连夜送到了文管所。”许建强回忆说,野外发掘工作结束后,他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办公室,将嵌有绿松石的青铜剑上的墓土小心翼翼地清理掉,边清理边仔细观察。

“呀!”许建强发出的惊讶声惊动了在外间办公室工作的同事。

“怎么回事?”同事进到里间办公室问许建强。

“我现在只能说这把是‘王剑’。”许建强无比兴奋,他在剑格上已看到了一个“王”字。

剑格上的泥土全部清理干净,上面现出八字鸟篆铭文。许建强通过研究比对,发现此剑竟然与1995年11月由原上海博物馆馆长、我国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担保,最终以136万港元成交,从香港国际拍卖中心购回藏于浙江省博物馆战国时期的“越王者旨於賜”剑,如出一辙。

根据《燕京学报》二十三期著录,寿县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曾出土过两柄形制与之相同的“越王者旨於賜”剑,其实物今不知藏于何处。新发掘出土的“越王者旨於賜”剑,是继1959年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古属州来)战国蔡声侯产墓出土的两件“越王者旨於賜”戈之后,又一次越国兵器考古的重要发现。

“越王者旨於賜”剑通长54.5、宽3.5-4.6厘米,由剑身、

剑格、剑柄和剑首四部分构成。在磨砺精细的剑格双面用绿松石镶嵌出极富美感的白色双勾空心鸟篆八字铭文:“王戊(越)王戊(越),者旨於賜”,剑柄上双箍也用绿松石嵌出精美的纹饰。

寿县出土的这把剑,除因墓室棺木腐朽塌陷受自然力的作用断呈三段稍有逊色外,依然是寒光湛湛,柔润犀利,透着杀气,仿佛把人们带到当年持剑主人叱咤风云,驰骋冲杀在战国疆场的历史长河之中。

许建强介绍,“者旨於賜”,一般观点认为是越王勾践之子颢与名,古越语的缓读音为者旨於賜,急读之则为颢与,公元前464年至前459年在位六年。剑的铭文称“越王”,应该是颢与在位六年时所铸之剑,距今约二千四百余年。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战争频繁发生的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促使青铜兵器得到长足发展。尤其是吴、越兵器,以其锋利无比,又精美绝伦而盛誉天下。

“目前国内已知所刊发有铭文可考的越王剑存世者,不过二三十柄,可谓凤毛麟角,因此更显其弥足珍贵。”许建强说,寿县出土的这柄“越王者旨於賜”剑,沧桑二千余年,丝毫不减当年之锐,正如三国曹丕在诗中所赞美的:“越民铸宝剑,出匣吐寒芒”,足见越王剑以其精湛而又独到的铸造工艺,在我国古代的兵器中独占鳌头。(张安浩)

## 吴昌硕铭“鱼戏砚”

砚为古人文房必备之物,秉四方灵气而写千古文明。文人以砚为田,以石为友,宝而藏之意犹未尽,或诗歌以咏,或铁笔以铭,浓缩了中国千载文风,蕴藏了历代文士之雅好。文人多好佳砚,嗜之深者则集砚为谱。清代以来,继高凤翰《砚史》、纪晓岚《阅微草堂砚谱》之后,沈石友的《沈氏砚林》被誉为砚中《石渠宝笈》,允称名砚中之翘楚!每有所出,识者均竞相购藏。

沈石友(1858—1917),原名汝瑾,字公周。因喜石砚,取石友别号。江苏常熟人。晚清著名诗人,于金石书画无所不好,晚年尤专于砚。集砚百数十方,砚质端、歙、澄泥、洮河皆备,雕工则山水、人物、鸟兽、瓜果俱全。沈氏歿后六年,其子沈若怀将其所藏名砚158方集拓成谱,分为四册,名曰《沈氏砚林》。谱中之砚大多为吴昌硕铭书,赵古泥镌刻。

“鱼戏砚”(见图)为《沈氏砚林》之中第145品,长20厘米,宽16厘米,厚2.5厘米。端溪仔石随形而作,巧制荷花一叶,砚背筋脉舒展,辐射四周,叶边隐隐隆起,卷向正面砚

堂。墨池正上镌刻“鱼戏”二篆字,侧刻“缶”字印。砚背依荷叶筋脉,吴昌硕作行草七绝一首,曰:“风露如含太液池,文心细似藕中丝。近时懒写鸳鸯字,但草西窗听雨诗。石友作,昌硕书。”刻“俊”字印。其上取金文刻“丙辰”二字,时年为1916年,吴昌硕73岁。此砚配红木天地盖,盖上桥本关雪以朱漆写“鱼戏砚”,盖内贴“白沙村庄”印鉴,外有民国时期蓝底锦盒。一眼望去,古意盎然。

佳砚既成,流转百年,砚以铭贵,情以砚传。缶老石友,酬和唱咏,肝胆相照,当与砚同传千万春!(童衍方)



## 东汉绿釉红陶井：厚葬习俗之遗存

山东德州市博物馆内,有一件高48、宽30厘米,通体施绿釉的东汉绿釉红陶井,陈列在第二展厅德州汉墓展区的独立展柜中,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件陶井是古人取水用的吗?它的造型与如今的水井有很多不同之处,有什么讲究吗?

有汉一代,厚葬习俗成风。汉代墓葬不仅陪葬品数量众多,而且大多制作精美,成为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界备受瞩目的一类文化遗存。

西汉早期的陶器陪葬品多以鼎、钗、盒等仿铜礼器为主,客观反映出等级观念这一时期深入人心。随着汉代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地主庄园经济的不断壮大,社会重心逐渐由上层贵族向中下层士大夫地主阶层转移,这一变化迅速反映在随葬物品的种类上。西汉中后期,仿铜陶礼器逐渐减少,东汉时期,出土的陶器以充满世俗气质与生活气息的模型明器为主,如:楼、灶、壶、勺、厕、耳杯、猪圈等,这些成比例缩小的陶制模型,成为研究汉代历史重要的资料。本文中为大家介绍的陶井,便是汉代模型明器中的一件精品。

水井是人类重要的生活、

生产设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水井,可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时期。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原始农业,这就要求人类的居所相对固定,为满足这样的生产、生活条件,水井便应运而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汉代的庄园主很有可能挖掘建造仅供自家使用的私人水井,作为重要的生产、生活设施,对于“事死如生”的汉代先民,没有理由不将水井陪葬在墓葬中,这就是陶井形成的原因。

山东德州市博物馆馆藏的东汉绿釉红陶井(见图),井身为上小下大的罐状,竖切面呈梯形,井身中部和下部饰有两组玄纹,两组玄纹之间印有水波纹,从井身形状来看,应为汉代典型的罐形陶井。井口平折沿,上接拱形井架,井架顶部塑有二鸟,回眸相望,神态生动;井架上部装有轱辘,与井口放置的水斗共同组成完整的汲水工具,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汉代先民的取水方式。

另外,除顶部的陶鸟外,井架两边装饰有四片叶形陶饰,此种装饰风格在东汉较为普遍,多见于连枝灯的灯盏旁,有学者推测叶形装饰物可能代表



东汉绿釉红陶井

汉代通天树的神仙观念,而这件陶井顶部的陶鸟,似乎更能证明其与树有关。

汉代陶井出土数量较多,但如此精美的陶井并不多见。结合墓葬中所出土的其他文物,我们可以推测,距今约2000年前的东汉早期,在德州生活着一位较为富有的庄园地主,离世后子孙将其埋葬,并将一件制作精美的绿釉红陶井放入墓中。(郭峰 吕宏伟)